

書名：《北宋三大文人集團》

作者：王水照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年7月

頁數：477頁

從問學者到治學者，手握韁繩，駕著“授課，研究，撰稿”的三駕馬車獨自前行，筆路藍縷以求心中所志之道。如此積蓄數十年，不斷打磨成型的《北宋三大文人集團》，即為王水照先生在這條漫漫長路上登覽觀眺、隨足力所到揮灑而成的遊記。

全書共分為序論，正文三章，結束語五個部分。就架構而言，本書以北宋文學史的發展脈絡為伏綫，將觀察視角聚焦於三大文人集團的生成、構造與接續，繪製出北宋士人嚶鳴求友、詩酒唱和的長卷圖軸，是一部結構謹嚴、環環相扣的專題著作。而千里江山亦可移步換景，全書各部拆分來看，亦是獨立成篇的學術論文。從讀書法而言，我們未必不可仿蘇東坡“八面受敵之法”，化整為散，從各個專題中尋找學術富礦，一窺治學門徑。

序論開宗明義，以北宋社會崇統思潮和結盟思想為背景，從廣泛意義上“以交往為聯結紐帶的文學群體”中，提出“文人集團”這一具有特殊內涵與外延的概念。具體來說，“北宋文人集團”是一種發展層次高、輻射影響大的文人群體，以其系列性區別於師弟單綫相傳、色彩單一、規模有限的學緣關係；以其文學性區分於前代以政治、文化、學術性質壓倒文學色彩的文人集團；又以其自覺性區別於依附皇室貴族、自主性有限的文人群體。換而言之，它的成立必須由文人士大夫為主導。核心成員在“文章盟主”自期下，往往強烈表達出對文學發展方向的自覺把控和對後繼人才培育的責任意識。於是，在概念的層層界定之下，錢、歐、蘇三大“文人集團”脫穎而出，成為北宋時期一種具有獨立考察價值的、延續性的文學現象。

其中,地域文化、景觀與文學是總揆錢幕僚佐文人集團的關鍵所在。如果說黃塵泥濘與逼仄喧囂可概括失意者們的汴京,則名花、古跡與榮休生活會喚起北宋人對“洛陽”最美好的想象。在這一積澱深厚的地理舞臺上,相公錢惟演充當“沙龍”主人,謝絳實際主盟,梅堯臣、尹洙、歐陽修為骨幹,繼而環繞以僚佐幕士與當地國子監生。衆人在風花雪月、詩酒文章的“閒暇”之中揮灑筆墨,贏取聲譽,也為日後“歐門”的形成打下了基礎。王先生就地域文化入手,拈出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兩端,對洛陽園林及種植於其中的牡丹、綠竹等標誌性景觀做出了重點分析(參見第一章第二節)。其中,園林作為傳統文人雅集的活動空間,早已是古都洛陽久負盛名的風景綫。它既提供“前賢時流所共同營造的文化氛圍”(頁74),又等待錢幕諸君子在流連遊賞中為之賦予新的價值。洛陽的牡丹、名園或許終有凋零殘頹之日,但它們作為一種文化景觀卻長存於文字之中,作為詩文酬唱的觸媒與精神遺跡的物質載體,在舊壁題詠與後日追憶的反復激發中,醞釀出獨屬於宋代的文化記憶和詩歌意象。此外,“景觀”又會生發出各種子課題和精巧的“小題目”:如洛陽人的賞花活動與歐梅詩中的牡丹意象(頁76—81);《龍門之遊和兩登嵩山的文化內涵》一小節(頁86—93)則從旅遊文化與文學入手,極寫歐、梅、尹諸人“訪僧問道、尋古覓碑、談詩論文”的“文人之遊”,為錢幕僚佐文學群體勾出頗上三毫,選題雖小而巧,具知秋窺豹之效。

制度、社交網絡、空間與文學活動的切入視角同樣引人注目。與錢幕中顯著的“地方長官-幕僚”機制相比,歐門的組建及發揮重要影響力的基點更依賴於嘉祐二年貢舉事件和由此形成的同年進士集團。書中這一章節的論述,選擇以相當大的篇幅圍繞科舉制度展開,從排擯“太學體”這一具體問題入手,分析宋代科舉制度與古文運動、文體文風改革的內在聯繫。同時,從士人社交網絡與文學發展的角度來看,歐門成員以嘉祐進士,錢幕舊友,歐氏學生為基礎,儘管品流駁雜,結構鬆散,卻網羅了曾鞏、王安石、蘇軾等文壇巨星。著者先抽繹梳理歐、曾、王、蘇等人“座主-門生”式的師友關係,又不憚繁瑣,極力考證同年進士成員與集團核心人物的交遊關係,引出歐陽修“託付斯文”的平生夙願與對繼任者的自覺選擇,也自然導向了歐門與蘇門之間的內在聯繫性和延續

性。在結構謹嚴、分析細密的第二章中，筆者尤為喜愛《“鎖院”詩歌唱和的文學活動》一節。王先生從詳析禮部貢舉“鎖院”制度出發，將目光凝縮於“尚書省東廂”這一閉鎖空間和特殊場所，以五十日鎖院制度下的文學產物“禮部唱和集”（已佚）為基礎，從歐陽修、梅堯臣、王珪等人文集中搜集相關材料，最大限度地還原了這場開啟元祐唱和先聲、堪稱風雅盛事的試院文會。文中涉及唐宋科舉風俗、制度運行過程、歐梅心態比較、“從和詩到和韻”文學現象等豐富話題，其研究方法與論述過程，已毫無疑問地成為了制度、空間與文學活動研究的經典範式。

就文學而論文學，本書在研究北宋文學風潮、諸作家文學活動與文人心態，乃至具體的文學發展規律、詩詞文創作機制等方面，都堪稱當行本色。接下來，筆者將談一談王先生在文本分析層面提供給我們的方法與思路。

首先是重視宋詩（詞）的群體風格和交互影響。在《宋詩新貌的孕育》一節中，著者強調，文學創作雖主要基於作家自身內心情感世界和創作個性表現而成，但也必然受制於接受和欣賞的一方。在“作者-文本-讀者”關係的交融中，個人風格“正是在接受朋輩們的讚許、商榷、碰撞和反饋中日趨鮮明和強化，並從而擴大影響，衍為宋詩的群體風格”（第102頁語）。於是，原詩與和詩、原文與和詩的交互關係得到了重視和強調。此觀念推廣至詞學領域，又成就了第三章中論《蘇門的詞評和詞作》、秦觀《千秋歲》與蘇門和韻詞的創作等精彩論述。研究者們在文本分析過程中，須特別關注同一作者或多名作者用不同文體，通過改寫、移植、唱和等形式，書寫同一內容或主題的現象。對此，尋找關聯作品並對之進行詩文、詩詞兩兩比勘的做法就顯得十分重要。書中論歐陽修評梅詩的部分頗為有趣。王先生指出，“歐陽修之所以能對梅詩平淡雋永的詩風有如此深切的把握，原因之一恰恰來自他相對於梅的異質性的藝術個性”。這一“詩風相異或對立的作家之間，有時反而能彼此傾倒，互相賞識”的現象（同時，為批評者所激賞的部分往往不是作者平生自負之處，由此又引出接受美學中評賞和理解的距離問題），以及詩歌“平淡說”“窮而後工論”，均為經久不衰且依然值得思考的文學批評論題。

再是推尋各文體間的內在關聯（其中隱含了對“以文為詩”“以詩為詞”等

文學現象的觀察)。於跨文體創作的比較,書中所示案例有謝絳《遊嵩山寄梅殿丞書》與梅堯臣《希深惠書……因誦而韻之》;歐陽修《醉翁亭記》與梅堯臣《寄題滁州醉翁亭》、《伐樹記》與《尹師魯治第伐樗》詩的對比。於創作主體的自覺反省,則特別關注歐陽修對古文寫作的錘煉(參見第二章第二節、第四節、第五節)。在此話題中,寫作者對自身作品的“改訂”“刪削”和“重寫”現象尤為引人入勝。文中對於歐氏《尹師魯墓志銘》、《范文正公神道碑》、《瀧岡阡表》等文的分析極為精當,“不畏先生嗔,卻怕後生笑”的歐陽修作為一個絕好案例,為信息不對稱的文本接受者揭示了寫作者隱於幕後的心態動機與創作過程。

三是廣泛利用前人詩話、文話成果以尋找問題點。書中對前人詩話、文話中各式評點、議論、公案的拈取利用,不僅限於宋人筆記,更廣泛採取了明清以來的詩學、詞學、文章學著作。王先生從浩瀚文海中搜集問題,讓後學者不禁感歎,有價值的學術論題的提煉,絕非一朝一夕之功。很多具體的文學判斷,如歐陽修對梅堯臣“縣古”一聯的繼承(頁109),錢惟演洛陽詩風的轉變(頁85),歐梅二人共同學韓的事實……既是對前人詩話、文話談藝成果的發掘,也是反復打磨后的深思獨得。只有從一絲不苟的文本細讀出發,纔能於字詞、句法、風格等細節層面見微知著,體察文人間的切磋、競技與學習的微妙心理,捕捉宋代文學發展脈絡下的暗流湧動。

當然,關於結束語中令人惆悵的“後蘇東坡時代”,也引起了筆者對於“文人集團”的生成、發展及其內在困境之思考。

主盟文壇,衆星拱之是一個有力的隱喻,暗示了文人集團所內含的競爭性、戰鬥性和主從關係。如歐梅、蘇黃以文為戰,逞才使氣,在詩文唱和中往往強調戰爭的比喻:如書中所引歐陽修“不戰先自卻,雖奔未甘降”(《讀蟠桃詩寄子美》),“嗟吾譬馳車,而失左右驂。勍敵嘗壓壘,羸兵當戒嚴”(《讀梅氏詩有感示徐生》)等詩,黃庭堅《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堅體……》更是典型。上述以戰爭為喻的語言表現,以及“付子斯文”“宗主”“嫡嗣”等言說方式,都暗示著政治權力在隱喻背後和現實世界中的存在。這就拋出了另一個問題:如果一代盟主無法身居高位、掌握政治上的話語權,如果一紙盟誓不能倚仗制

度的威權，以號令的形式發出，則真正具備廣泛影響力的盟會是否還能成立？這是蘇門學士風流雲散之後，留給我們的一個必須思考的問題。

在“北宋三大文人集團”的基礎上，我們可繼續沿著這一思路，去尋找元祐時代後的類似文化現象（隱藏在歐蘇背後，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王門”也值得注意）。然而，或由文獻不足徵故，或由歷史“像淘氣搗亂的小孩子”故（錢鍾書《七綴集》中語），這一現象在時代的驚變之下日漸式微而越來越難以捕捉。正如《結束語：後蘇東坡時代》所言，文壇的形成和盟主的出現不由人爲刻意製造而誕生。凝聚於蘇軾個人文學才能和性格魅力之下的蘇門，儼然已是“文人集團”自主發展的範例與最高階段。遺憾的是，隨著蘇軾的離世，這一文學史上此起彼伏的結盟高潮逐漸退去。後續地方性的文學群體，或由政治環境壓迫、成員才能有限、盟主號召不足等緣故，未能獲得全國性的文學影響力。終宋之一代，再不見嘉祐、元祐時期如此星光璀璨、冠蓋雲集的文壇盛況。

文學與政治的關係離合牽動著一時代的文學風貌，文人群體與政治的關係變遷也常常帶來戲劇性的歷史效果。文人近之則爲幕中之客，卻不免流於平庸作品的批量製造，乃至陷入朋黨相爭的泥淖，徹底失去文學者的初心。遠之則閒居鄉里，結社論詩，由中央官僚轉化爲地方鄉紳。癡心詩文的寫作者形象不斷出現在地域文學史的敘述中，但唯我獨尊式的一代文宗卻再難誕降。更何況，當詩文創作被視爲一種“閒工夫”或“敲門磚”之後，傳付斯文的使命也自然不再成爲南宋士大夫們念茲在茲的事物了。似乎很難做出選擇，文人騷客們是應該繼續執起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大纛以爭奪陣地；還是毅然放棄“文會忝予盟，詩壇推子將”的浩大聲勢，轉而以“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蒹藻之菜”爲薦，優遊於師友酬唱、切磋琢磨的一方自得天地？朱熹曾無不惋惜地談及，“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卻盡日唱和而已。”朱熹心上的“無限事”，難說是政治上事、文學上事，還是道理上事，則“文人集團”究竟應該做什麼事，往什麼方向發展，在南宋已然出現了更多新的可能。

錢鍾書先生在《七綴集》中寫道：“在歷史過程裏，事物的發生和發展往往跟我們鬧彆扭，惡作劇，推翻了我們定下的鐵案，塗抹了我們畫出的藍圖，給我們的不透風、不漏水的嚴密理論系統搗上大大小小的窟窿。”在文學史研究過

程中,我們既不該摧折歷史無常的本性,也不應失去尋求解釋的信心。畢竟,在越是瑣碎混亂,千頭萬緒的歷史、文學現象中,就越是需要研究者銳利的眼光、精巧的框架與富有膽識的概括力。

無論如何,以某時代“文人集團”的產生、消亡與變貌入手,探討一時代文學之起伏、離合與特徵,仍是一個富有解釋力的研究視角,經得起後來的研究者們從社會文化、政治、學術等各種層面著手繼續考察。儘管它不能帶來一個可以一勞永逸、無限複製的闡釋方法,卻指出了在信息量龐雜的長時段文學史研究、文學現象觀察中綱舉目張的向上一路。即便跳出“文人集團”的框架,本書也為我們展現了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無間然的結合,提供了許多類型豐富、延展性強的好題目。其中不少話題,在距成稿三十餘年的今日仍見影響、效仿。這既是王先生文章、論文選題生命力的體現,也向問學者提示了萬變不離其宗的作文法門。

(作者: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麥嘉倩)